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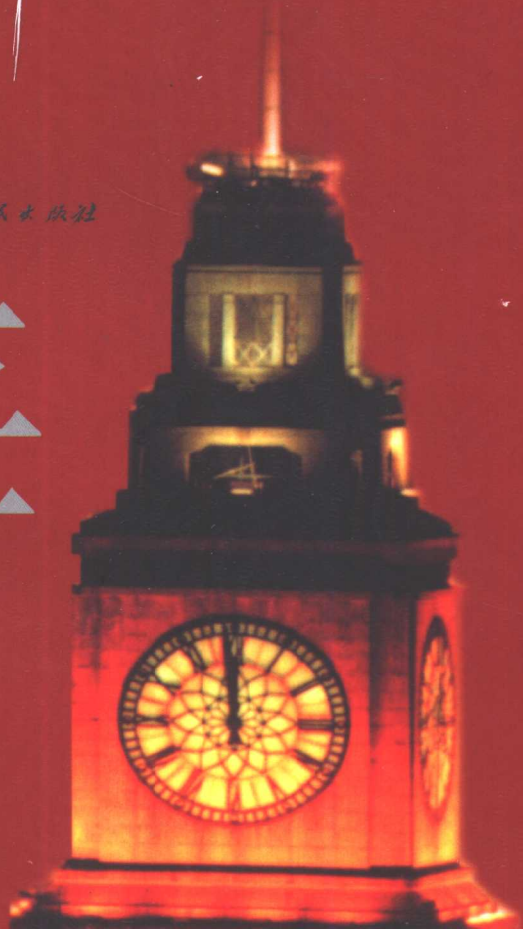
穿越霓虹 穿越梧桐

触
摸

刘业雄◎著

上
海
话

上海人民出版社



穿越霓虹
穿越梧桐

触

摸

刘业雄◎著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海

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霓虹 穿越梧桐:触摸上海话/刘业雄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ISBN 7-208-04622-0

I. 穿... II. 刘... III. 吴语-自学参考资料 IV.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687 号

责任编辑 曹文娟

封面装帧 傅惟本

穿越霓虹 穿越梧桐

——触摸上海话

刘业雄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3 字数 182,000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4622-0/G·860

定价 14.70 元

目 录

开 篇	一个蔚蓝的精灵在沉浮:天马行空的上海话	001
第一章	城南旧事:前世今生的上海话	029
一、	唧唧唧,骑马到松江	
	——寄人篱下的上海话	029
二、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南腔北调的上海话	043
三、	优雅地转了一个身	
	——洋泾浜边的上海话	060
第二章	暗香浮动:另有一功的上海话	081
一、	都市表情的印证	
	——精明实惠的上海话	081
二、	蔷薇蔷薇处处开	
	——风情万种的上海话	103
三、	嬉笑怒骂也成文章	
	——斑驳陆离的上海话	120
第三章	借你一双慧眼吧:交关要命的上海话	141

后 语 涛声不再依旧：不守本分的上海话	241
主要参考书目	249

开篇 一个蔚蓝的精灵在沉浮： 天马行空的上海话

1

中国不少地方都有自己的“××大怪”。

譬如，镇江有“三大怪”：“肴肉不当菜，香醋摆不坏，面锅里煮锅盖。”

还譬如，东北有“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二八大姐拿着早烟袋，养活的小孩吊起来。”

再譬如，陕西有“十大怪”：“房屋半边盖，帕帕头上戴，姑娘不对外，烙饼像锅盖，石头枕起来，面条像腰带，碗盆难分开，辣子是道菜，唱戏吼起来，凳子不坐蹲起来。”

再再譬如，云南还有“十八大怪”……

如果洗去了语言上的俏皮与夸张，这些地域特色、民俗风情与生活细节的俚谣性描述，都在有意无意地偏护与夸耀、验证与渲染着当地的文化状态与生态模式。“××大怪”同那些可供谈资的“××十景”、“××新十景”一样，横亘在世人的面前，呈现一种具有活生生质感的文化实践状态，起着传递乡土名片的效用。

甚是遗憾，没有类似的“上海××大怪”的顺口溜。

大概是因为圆通的上海人见多识广、见怪不怪，正像沪上童谣所

唱的“三三三，我们都是木头人……”，都“木”掉了。也有可能上海人整天“投五投六”、飘忽不定，忙煞哉，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去追慕、过滤和蒸馏那些民俗，再合辙押韵地强化、夸张一番。

其实，上海应该也可以总结出许多“怪”。譬如，关于上海人“精明不高明”之类的痛彻骨髓的暗疾（已经让上海人听得“七歪八起”，耳朵里生了老茧，熟透熟透）；还有，被人“辣手辣脚”地“吃排头”吃惯了，弄得明明是上海男人，偏偏不敢承认自己是上海男人；还有，外地同志称赞一个上海人的“最高级褒义词”竟然是“你不像一个上海人”，使上海人像吞下一只苍蝇一样，有点难以描述的苦涩与恶心，至少很是啼笑皆非……

如果一定要凑出一套“上海××大怪”，那么，肯定还有一个绝对可以进入三甲之列的“东东”——

上海话。

2

上海话很怪很怪。

怪之一——上海话特别顽固。

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天津大学生之间是不大讲天津话的，虽然天津话那么火红热闹，天津卫又是一箭之遥的“贴隔壁邻居”；两个四川大学生当着别人的面，也不常用四川话接头，虽然它是那么辛辣滚烫，巴山蜀水又养育了那么多领袖与元勋；几个东北大学生同样如此，虽然赵本山、黄宏、潘长江、宋丹丹、巩汉林们早已经用富有张力的东北话制服了电视荧屏前黄发垂髻的观众，虽然雪村那一声“翠花，上酸菜”的如痴如醉的呼唤放倒了那么多比肩继踵的发烧友；大学生中有人甚至无奈与悲凉地拒绝承认会讲自己的方言，一定要坚持用让人听得头皮发麻的“京片子”遛遛出一套“伪北京话”（或云“准北京话”）。一般而言，地方上来的人到了执文化牛耳的首善之

区,都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敬畏之意、羞怯之感,或者个子先自矮了三分,或者舌尖先自僵化半截,以至于情不自禁地舍弃、抖落了自己从诞生起就操练多年的、浸透自己饱满精血的、可能已经有点土灰蒙蒙的方言,吞吐起标准或不那么标准的琅琅普通话了。也许,这里存有一点仓皇、哽咽与恐慌——怕被北京人视为异端与被排斥,与陈凯歌在《少年凯歌》里讲述到的为什么“文革”中的人们显得特别异常、疯狂颇有几分相似。

惟独上海大学生不然,毅然跳出了这个怪圈。他们一旦互相碰到,验证了对方的“出身”后,则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场合、就何种话题,都坚决要讲上海话,而且绝对旁若无人、肆无忌惮、畅所欲言、绘形绘色、眉飞色舞、神魂颠倒。他们是这样与众不同,如同在炎炎赤道线上一群身穿厚厚的兽皮我行我素走着的执著的因纽特人(旧称爱斯基摩人)。有人描述道:

两个上海籍的学生只要一见面,准会立即像两挺早已压满了子弹上了膛、瞄准好了的机关枪一样,对着对方:开火!

以上是指两个人之间,人多了就更热闹了。上海人一多,上海话就更多了,听起来像是亲临银蛇乱舞的淮海战役火线上一样:

只听:“哒哒哒……”

只听:“啪啪啪……”

虽有打冷枪的,但绝无臭子儿!

齐天大《妈妈的舌头》

据说,宋庆龄与宋美龄尽管有各自的理想、抱负和婚姻,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追求,但这些无法割断自幼孕育起来的姊妹深情。在抗战期间,一条秘密的电话线便充当了两人亲情的联络使者。每次通话宋美龄总会先亲切地用上海话唤一声:“阿姊吗?”宋庆龄则用上

海话回应道：“美龄吗？”她们每每通话，总是要用那地地道道的上海话，因为听来显得尤为亲切与热络。

2002年12月，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正在采访中国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上海电视台的记者，遇到了几个在摩纳哥惟一的一所大学留学的上海人，那个上海小伙子一见到故乡人，立刻就兴奋地操起了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全然不顾正在“虎视眈眈”地瞄准他们的摄像机与收看节目的广大中国观众。

“上海热线”的电子公告栏中曾有一个“上海人的100个缺点”的话题，其中关于上海话的有3个。除了一个是“上海人整天说‘canna’”外，一则是“在外地旅游时肆无忌惮地大声说上海话，上海人对此已司空见惯，但是，其实这是素质不高的表现”，另一则是“现在到处都在提倡讲普通话，但是，很少上海人能够做到……”。

上海话已经是上海人特有的一种近乎怪异的特殊表情。

上海人之间在外无拘无碍地大肆运用上海话，是一种彼此袒露了语言的“身份证”与“介绍信”后的兴遇性契合。唐人贺知章诗曰：“乡音未改鬓毛衰”，老乡之间最直接、最简易和最明显的认同就是乡音，即方言。有一则故事，说明末清初时候有一个靖江人在外做生意，结果蚀了本，囊空如洗，难回故乡。他慕名找到一个在南京当大官但素昧平生的老乡，企望或许可以借到钱。那当官的对其审视良久，问道：“你有什么可以证明是靖江人呢？”那生意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官人说：“你如果能够用靖江话说完全一句话，便认你为老乡。”一番对话后，果然凭一段纯正的靖江话，生意人借到钱顺利回家了。正如一首叫《乡里乡亲》的歌所唱的：“乡音是永不过期的介绍信，乡音是老祖宗盖上的烙印。”相反，“摆脱故乡的第一步是摆脱方言”（余秋雨语）。永远只能操着一口方言的漂泊的流浪者，他永远无法割断与家乡的脐带而真正溶入他乡的血脉。而一旦与同乡相遇，这“脐带”就马上把他与家乡联结起来了。

至于上海话为什么那么顽固,多半可能是因为做了上海人而骄傲,甚至有一点故意的卖弄,存一丝得意的噱头;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时候在上海话里设置了一些小小的语言陷阱,“陷阱”与“反陷阱”使他们有一种刺激神经末梢的愉悦功能;也有可能是因为只有上海话才使他们如鱼得水、轻松欢快,思路才能跳跃顺畅,沟通才能共振和谐;更有可能的是,上海人与上海话已经无法断然割裂了。这使人们想起了巴西的波罗罗部落人,他们自称是“金刚鹦鹉”。人类学家解释道,这根本不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死后会变成鹦鹉或者鹦鹉会变成波罗罗人,像庄子与蝴蝶的轮回转换关系一样,而是说他们自认为“现在就已经是真正的金刚鹦鹉了”。这是很滑稽的、令我们无法想象的理解。天呵,他们怎么会认为自己身上长了羽毛和钩形嘴呢?据说,波罗罗部落人在他们的智慧里已经领悟到了自己与鹦鹉间的某种内在的同一性,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存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同理可推,上海人只有说上海话时才感到自己是上海人,上海人感到自己是上海人时必然会说上海话。上海话是深深融进上海人血液、骨髓甚至细胞、基因里的东西。这与歧视外乡人全然无关,至少不全如此。甚至他们不怕因此而被人狠狠地隔绝。

上海话的用词也这般顽固。

上海话里有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嗲”字。“嗲”是对上海女性的魅力的综合评价,它是那么恰如其分,确实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准确、更生动、更形象的形容词了,它的出现简直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其他形容词从此“六宫粉黛无颜色”。但是,这个“嗲”的命运却并不一直很“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沦落成了一个十足的贬义词,几乎等同于“故作忸怩之态”的“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秦淮女子。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它曾遭到义愤填膺的声讨与口诛笔伐的围剿,批判者把它的出身一直追溯到解放前的黄色小报,并一口咬定是小流氓的切口,“如果任其流传”,一定会“使它的孪生兄弟

猖獗起来”，“破坏祖国语言纯洁”，造成“青少年词汇贫乏”和“满口黑话”的严重后果。当时确实收到了杀鸡给猴看的成效，被潮起潮涌的政治风云弄得噤若寒蝉的、素来乖巧的上海人不仅谁也不敢再“嗲”了，而且也不敢唠叨其他什么“孪生兄弟”了。语言“纯洁”是“纯洁”了，但这段时间恰恰是上海话发展最缓慢的日子。

但谁能够料到，争论才过了三四十年，“嗲”字又神秘地重新活跃在上海人的嘴巴上，又勃然地“嗲”来“嗲”去，“回眸一笑百媚生”了，连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与2002年的“增补本”都收入了这个“嗲”的“形容撒娇的声音或姿态”和“好；优异”两条义项。上海人对“嗲”实在非常“买账”，一旦认定了，便“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大批判与行政命令只能在旁边瞎起劲。同时，“嗲”的不少“孪生兄弟”也如发酵般“死灰复燃”，再一次“猖獗”起来了。

再举一例。上海话里曾有一个“懂经”的词语，意即“在行”、“谙熟门道”、“识时务”，譬如“人还没有发育好，敲定（对象）倒有了，这个小鬼在这方面倒蛮懂经的”。这个词语出现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流行圈子不小，个中人颇有点“津津乐道”。到了80年代开始就被其他更生动的词语所替代了，偶有流露者，则常常被人笑鄙之——真正有点不“懂经”矣，于是，也就渐渐销声匿迹了。谁能想到，在2002年10月末的上海报刊上又重新见其身影了：从第49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载誉归来的青年小提琴家黄蒙拉在上海大剧院举办了独奏音乐会，向家乡父老展示了世界顶级音乐赛事金奖得主的非凡实力，第二天的上海传媒纷纷报道这桩雅事，而上海一家大报以《帕格尼尼在沪“复活”》为题的消息里竟然有“黄蒙拉精彩绝伦的演奏令沪上不少‘懂经’的小提琴发烧友惊呼：‘他有一双魔手’”一句。捧报读到此，我也忍不住“惊呼”了——“懂经”一词真有“复活”的非凡魔力，“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

还有一个“洋钿”。上海人常常把“钱”说成“洋钿”，例如：“这双

袜子要卖 10 块洋钿呢!”“这种音乐会,票子最起码 60 块洋钿一张!”“对不起,我袋袋里只有廿块洋钿!”这“洋钿”原本是指银元,与中国人以前惯用的“铜钱”不同,是由洋人引进来的。洋钱在清朝统称为“番银”,因品种不一,还有许多别的叫法,价格也有高有低,后来,中国人自己铸造了银元,有“大头小头”之谓,解放之初,硝烟甫定,在上海的街头还有交换这种“大头小头”的吆喝声。银元停止使用距今已有 50 多年了,“洋钿”就更早了,它们与现在的纸币、硬币、信用卡什么的,浑身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遇到整数,这个“洋钿”依然在上海人嘴里吐进吐出,神气活现得很。至于绝迹上百年的铜钱,上海话称之为“铜钿”,至今依然生命力旺盛,与“钞票”相提并论,而且比“洋钿”使用范围还要广泛得多,或整或零都可以。想起来,真有点笑自己。

上海话的顽固可见一斑。

这种“顽固”顽固在根子里。

3

上海话怪之二是特别难懂。

难懂之一是难以“听”懂,尤其对“北人”而言。这与一般方言是同样的情况。在标准语之外,更为自然的、经常使用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地方变体,也就是种种方言,每一种方言都涂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犹如斑驳的调色板,深深地融化与贯注了地方元气与文化烙印。或轻灵婉转、或耐纯凝重的方言其实都或多或少难以听懂,甚至“不知所云”,譬如温州话、福州话,在外人听起来几乎要发疯。而人们用“鸟语”一词代表非常折磨人的耳朵与大脑的广东话,恐怕已经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形容了。这也就是国家积极推广普通话的起因。而不少杂交嫁接的“地方性普通话”,就因为方言味积重难返,往往被好事之徒引为茶余饭后的笑谈趣闻。比如,广东曾有一位领导,深恶痛绝广东人既听不懂外地话(包括普通话),又不想让外地人听懂广东话,

于是决心学好普通话，并且在各种场合积极学讲推广，结果留下了不少足以喷饭的逸事，其中一则为，他把“先生们、女士们”念成“先生们、女婿们”，使哄堂大笑的听众纷纷半真半假地询问之：“您有这么多的女儿吗？”再比如，上海一位幼儿园的女教师让孩子们看看图片，结果孩子们却不约而同地亮出了自己的肚皮，因为上海话的“片”与“皮”的韵母是一样的，“图”与“肚”又是不分的，而这个上海籍的女教师的普通话偏偏又十分“搭僵”，把“图片”与“肚皮”纠缠在一起了。这是上海人很熟悉的一则笑话。

上海话自然有难懂的地方，尽管有人称，上海话的吴音非常好听，并不像鼻音厚重的广东话“听起来就不那么入耳，多以惊叹号般的重大尾音收场，从话中根本听不出中华正宗文化的优雅”。但这好听并不能丝毫冲淡听懂上海话之难度，正如许多绵延百年的外国古典交响乐，往往使许多一般听众的理智分辨与精神生命可笑地、艰涩地陷于尴尬的困境，尽管它们可能非常“好听”。相声大师侯宝林在一段《戏剧与方言》中，有一个“包袱”说的就是一个北方人因为区分不清“汰头”与“打头”而闹了一场误会的趣事。

既然是变体，难懂是必然无法避免的。有一位署名“小寒”的女士在《申江服务导报》上题为《要在上海学上海闲话》的文章里说道：

……真学起来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普通话还好对付，而上海话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在学外语。那么多仄声与入声字，要像记单词一样一个一个记，“哥哥末世”就是“这个东西”，“花子领子”就是“暗示”，“香糊粥”就是“莴笋”，诸如此类想象中的意思与实际使用中的含义颠三倒四的词，弄得我头痛。即使记住了这些词的意思，说出来的声音往往也不对。

有一位姓纪的先生与太太双双从四川到上海来攻读博士。一

次，两人路过学校附近的一个排档，看别人都津津有味地吃漂着辣油的油豆腐细粉汤，馋得两人直流口水，坐下来点了两份。老板很热情地招呼：“细粉要不要多加点？自家做的，味道老好的，要加点哦？”纪太太心里直犯嘀咕：“自家做的洗衣粉也能吃？该不是毒品吧？”于是连连说不吃了不吃了，拉起丈夫的手落荒而逃。

上海某单位一个刚刚从部队转业的军人，在食堂里用餐后，拿着厨师随餐一起发下的一根皮色有点发青的香蕉，对一个同事说：“这种香蕉还没熟透，味儿不甜。”这位上海同事接过话茬，用带浓重上海腔的所谓“上海普通话”对他解释道：“这没关系，只要你放一枪（放一段时间）就好吃了。”这位来自北方的转业军人非常疑惑地问道：“怎么，香蕉还得要开一枪才能吃呀？”

民国之初，上海人陆徵祥被誉为“满腹经纶”、“亲藹诚实”，被定为内阁总理。不料，在组阁演说中“不脱上海土音”，北方军阀与政客们“听来不知所云”，一怒之下，以总理“言词猥琐如此”为由，将其轰下了总理宝座。

上海申花SVA足球队的“胖子”曲圣卿的“随队”媳妇王欣无可奈何地坦言：“我一点儿听不懂上海话，也不想听懂，太难了。”

但上海话的真正难学并不在“听”，而在“看”。这与其他方言就大相径庭了。一般而言，如果把方言写出来——如果写得出来的话——人们应该是可以大致看得懂的（当然，广东话——遗憾，又是广东话——不属此类，因为广东人常常喜欢生造一些方块的字形，比读“咁”、“侃”之类还需要更充分的魄力与想象力，自说自话地把它说成也是汉字，足以把所有的外人——包括那受鸟兽足迹启发而造字的仓颉，看得目瞪口呆，恨不得哭一顿）。比如《大话西游》里那段脍炙人口的台词，倘若写成东北话版：

曾有一份贼纯的爱情，搁在俺眼前，俺没咋当一回事，直到

整没了，俺才发现，世上最憋屈的事也就这样了。如果老天爷再给俺一次机会，俺愿意对那个闺女说：“俺稀罕你！”如果非要给这件事整个头的话，俺希望这个整头是一万年！

除了不多的一些词语，我们还是可以几乎完整地把它们一一对照到标准的普通话版去：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后来才后悔，人世间对我最好的就是你了，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讲三个字：“我爱你！”如果一定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个日期，我希望是一万年！

这是因为，不少方言里特有的词汇虽然很多，人们一见之下，却往往能够“望文生义”，猜个八九不离十。当然，也有一些上海话词语同样如此，付诸文字以后，人们也是可以看得懂的。如上文所说的“哥哥末世”、“花子领子”、“香猢猻”、“洗衣粉”、“放一抢”等等，不管读起来怎么云山雾罩、朦朦胧胧，不管怎么匪夷所思，写下来后就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成了“这个东西”、“暗示”、“莴笋”、“细粉”、“放一段时间”，谁都可以一眼看懂。可实际状况远非这样简单。有时候，把上海话照式照样写下来，但整个句子往往依然不知所云。

如果我们再看看那段《大话西游》的上海话版：

老里八早，有一段老刮三的感情摆勒在我格眼门前，碰到赤佬了，我没去睬伊，等到格段感情窝死空勒以后，我再晓得奈么这记僵特了，假使讲老天爷拎得清让我再来一趟，我勿会神志胡智了，呆卜落笃看伊跑特，我会跟伊讲我老欢喜依格，假使一定要拨伊敲定一段日脚，格么我想随便哪能总归要一万年！

呵,这里有多少硌牙的石头、沙子呀!“老里八早”,“老刮三”,“碰到赤佬”,“窝死空”,“拎得清”,“呆卜落笃”,“敲定”……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方言。面对这些完完全全聚敛着陌生感的词儿,谁能猜得准?连周星驰也该大叫“无厘头”了。

还有,上海话里的“吼势”、“乌苏”、“挖塞”,都属于只能“大眼瞪小眼”的对象。而且很难用普通话准确、完整地解释出来,连写出来我也感到很有点勉强,因为它们有音而无形。不过,一旦碰上这些难缠的上海话词语,如果人们先自凜起精神,或向上海人请教,或翻上海方言词典,我想,大致也能勉强“整”明白——这“整”属于东北方言,我们关内人一见,一想,多少也明白一点了。

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属于更难、更严重或者更糟糕、更危险。有相当多的上海话(尤其是流行语),人们一看就“懂”,或者通过查辞典认为自己可能懂、应该懂、已经懂,而实际上偏偏依然不懂——“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错得一塌糊涂,不是想当然能稍懂一二的。

这一种情况,就是指方言里常常有一些词语的使用范围各有不同,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比如“老爹”一词,上海话里指祖父,湖北话里指老头子;“堂客”在长沙话里指妻子,而湖北话里指妓女;“老公”在南方指丈夫,在天津话里指乌鸦,在河北、山东话里指雄性昆虫;“妹子”在湖南话里指女儿,在西北地区指情人;湖南话里“作家”指老农,“鸽子”指布谷鸟,“采矿”指选择墓地,湖南话里、福州话里“老妈”指爱人,福建话里“鸟飞”指人死,西北地区“对火儿”指亲吻……外地人简直匪夷所思。港台语里有些词语更这样,如“语文”指“外语”,“华语文”指“对外汉语”,“喉管”指“自来水管”,“白纸扇”指“黑社会里出谋划策者”,“北大人”指“寒潮”,“八卦”指“说长道短的无聊举动”,“医生纸”指“医生开具的诊断证明书”,“飙口水”指“闲扯”,“班房”指“教室”,“大头虾”指“马大哈”,“搞搞震”指“瞎起哄”,

“砌生猪肉”指“诽谤”，“跌眼镜”指“看走了眼”……让内地人望而生畏。

而上海话里则更盛。“嫖”、“赵”、“胸闷”、“头子”、“上路”、“花头”、“路道”、“电车路”、“脚碰脚”、“好白话”、“孵豆芽”、“一句闲话”、“一手一脚”、“一点一划”……您说看不懂吗？似乎亏待了自己，很有点说不过去，因为自己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文化水准，甚至可能自己的方言里也有类似的词语呢。但您以为自己真的已经懂了吗？许多突然热闹起来的事实证明，那与辞典上的解释，与自己平时的理解，与自己方言的用法，实际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想自个儿猜上海话？谈也不要谈，那只是在无谓地销蚀自己的智慧与信心，白白地翻卷着自己的情绪与企待！甚至可能从此怀疑人类语言所散发的蓬勃热能，以为自己触摸到了世事的虚假与市器。

还有一个上海人常用的句子：“谢谢一家门！”这无论让谁猜（这个词还需要猜？）都是一个礼貌用语，表示对受话者一家人的感谢嘛！其实大不然，“谢谢”在上海话里是非常微妙的，正如在剧场里的一声“好”，可能是对演员演技的称赞，由衷发出的叫好声；但也完全可能是一声倒好呢！同样，上海人的一声“谢谢”既可以是对别人的感激，也可以是不同意的意思。这倒和字典里“谢”的解释之一“辞去、拒绝”有点相符。如果有人请吃饭，说一声“谢谢”，可以是表示欢迎、同意赴席，但也可以表示拒绝，表示没有这个胃口。所谓“谢”，多半是表示“恶劣”，其人对某种事物已经领教过了，有过上当的教训，以一声“谢”，配合拱以双手，表示不敢苟同。“谢谢”之后加上“一家门”，意谓一家人中出了一个糟糕的角色，连这家人都不是好东西。这当然很武断，但蕴涵的痛心疾首也是溢于言表的。上海最近有出滑稽戏，讽刺的是一个“不二不三”的家庭，用人时眼睛只盯着家属亲友，全然不顾及企业的发展生存，而且严重拖了企业的后腿，陷企业于水深火热之中，剧目就是《谢谢一家门》。如果不解此中意，在交往中贸